

# 为什么发表论文时，经常让导师排名第一

□ 胡波

最近，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发布《关于规范学术论著署名问题负面行为清单的通知》，列出7类学术论著署名负面行为，强调“不得侵害直接实施科学实验的研究生等基本署名权，不得为均衡其他非学术利益而随意调整学生的署名及其署名位置”。

论文署名权既关系到学术规范，也关乎学术贡献的确认以及科研成果受益的分配。维护研究生的论文署名权，既是对研究生科研付出的尊重和认可，也是在维护学术科研诚信。

尽管研究生确定导师的方式是双向选择，但学生真正与导师相处之前，很难真正了解导师的个人性格与职业品德。碰上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导师，对于学生来说固然是幸运。让很多研究生真正纠结的是，如果遇上行事不公的老板，选择与之闹翻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益处。师生关系难以维系不说，也可能影响前程，因此不少学生只得忍气吞声。

中科院的这份通知是针对导师的，而且面向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涉及科学实验，多是靠团队合作完成，其署名有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之别，其先后顺序也相对复杂一些。

论文署名问题不仅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笔者一个朋友曾说过，他为了考取某个教授名下的博士生，当面去拜访，结果该教授直接表明，发论文必须把他作为第一作者。朋友很是不解，该教授在学术圈内也算是较有名气了，为何还如此看重这点利益。

笔者还注意到，当下侵害研究生论文署名权现象不仅发生师生之间，还发生在一些学术期刊和研究生之间。笔者从事的研究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平时浏览一些学术期刊点评、论文发表经验交流的网站，发现有不少作者抱怨：有的期刊不允许研究生成为论文第一作者，必须把导师排名第

一才肯予以发表。

学术期刊侵犯研究生的署名权，多是出于提高期刊评价的知名度和排行榜考虑。在期刊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不少期刊更加偏重发表知名教授和博导的论文，以便提升引用率。当然，作为相对成熟的学者群体，教授、博导们的学术质量也普遍更高一筹，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要求一篇研究生独立撰写的论文，以导师为第一作者发表，实属罔顾学术基本规范，伤害学生权益。

学术期刊本就处于强势地位，在论文版面稀缺的时代，很多研究生不得不服从潜规则，以换取来之不易的发表机会。更何况，不少学校也认可导师一作、研究生二

作的论文，这些成果也可以作为毕业或是评奖评优的条件，这就为学生委曲求全提供了相对的余地。然而，这毕竟是以牺牲科研诚信为代价，对这种潜规则的默认，也是在助长不健康的科研环境。

事实上，不管是导师，还是学术期刊，大都清楚学术论文署名的基本规范，这种明知故犯，不过是因为他们占据优势位置，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罢了。我们在关注导师侵犯研究生论文署名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学术期刊这个灰色地带。相关部门也亟须畅通监管渠道，严格加强对学术期刊的规范和管理，塑造一个更加清朗和纯粹的学术空间。

## 关注抑郁症患者 不能只靠药物与医生

□ 罗广彦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逾2.8亿人罹患抑郁症，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抑郁症可能直接导致自杀行为，这是全世界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中国境内，抑郁发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有研究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全球抑郁症病例就猛增28%，如何遏制全球性的抑郁症危机，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议题。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柳叶刀》发表《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了》，该报告由全球各地的25名专家联合完成。报告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身体疾病像抑郁症那样常见，但它却很少得到政策关注和社会资源。研究者们坦承，抑郁症单纯靠卫生系统的努力无法解决，缓解、治愈抑郁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帮助。其中的中国作者、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肖水源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抑郁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单纯依靠卫生系统是解决不了的。

不能只靠卫生系统解决病症，听起来匪夷所思，治病不靠医生还能靠谁？其实，虽然抑郁症不是传染病，但联合行动的道理却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十分类似。如果只靠医护人员治病，没有政府和社会大众携手做好预防、宣传、检查、善后工作，其势头很难得以遏制。

在预防层面着手，是降低抑郁症发病率最有效的手段，而这也是卫生系统无能为力的首要原因：大部分预防措施都在卫生机构之外进行，这正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助力。青少年是抑郁症高发人群，可能影响终身。202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家暴、校园霸凌、学业压力等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是直接引发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因素，而这些都是医学以外事务。学校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的精神困惑提供帮助，观察青少年是否遭受家暴或校园暴力；政府则应细化相关法律

条文，向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当青少年不再被这些不良因素影响时，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即使有抑郁的症状，他们主动向师长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抑郁症让医生束手无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患者根本没有走入医院接受治疗。据统计，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80%-90%。此前有报道指出：我国抑郁症患者仅有3.6%接受过精神科专科治疗。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提醒我们关注抑郁障碍患者群体的痛苦与无助。

患者拒绝寻求医疗帮助，主要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了解不足。一方面是对其症状及治疗不了解，当患者自己出现躯体症状，如容易疲劳或食欲不振时，不会想到寻求精神科的医疗帮助，身边的亲友也不会提醒与抑郁有关；另一方面是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与社会歧视，不少人将抑郁症症状与患者的个人素质联系在一起，指责其心理脆弱、玻璃心，因此才会患上抑郁症，使得患者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寻求医疗帮助。

要提升大众对抑郁症的了解，首先需要普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这不能只靠医生与研究人员的努力，同样需要政府与社会联手协作。政府需要加强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保护抑郁症患者的就业、隐私等合法权利，杜绝对该群体的歧视，让就诊患者没有后顾之忧；在社区、工作场所、网络空间等领域，社会力量也应以各种方式宣传抑郁知识及就诊指南，让有需要的人得到相关信息，鼓励患者就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依照相应规范，招募低成本的非专业人员，为精神科方面提供初步的咨询与就诊指导。据有关研究显示，这不仅可以解决精神卫生人员的严重短缺，同时能够降低患者的就诊成本，更重要的是，当抑郁患者就诊普遍且方便时，患者的耻辱感会显著下降，他们会更愿意去医院精神科就诊。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抑郁症患者得到足够的治疗，他们很可能得以康复。但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医生与药物，更需要法律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关心与保护。

## 视频平台 教授开讲 知识的大众化传播不必正襟危坐

□ 欧阳晨雨

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选择在年轻人喜爱的视频平台上开课，在视频网站上大学，这句曾经的调侃正在走向现实。骆玉明、汪品先、戴建业、于赓哲等知名学者纷纷出圈，短视频平台成为他们传播知识、演绎经典的全新舞台。

从火爆程度上看，不难看出他们的选择对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一名普通高校教师，面对的也就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学生，就算是公开课，也不过千把人。借助视频平台，通过网络传播，名师大家们收获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实现了桃李满网络，无疑是技术进步创造的奇迹。

客观讲，在如今的大学课堂，再精彩的课，再用心，也总有一些神游四海者。这不是说学生不尊重老师，而是他们的兴趣未必在这些课程上，强扭的瓜不甜。但在视频平台开课不一样，学生都是慕名而来，凭兴趣而听，没有被动的学业压力，也没有太多利益的考量。在这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之下，讲者与听者之间的交流更为自主，进而能让双方实现各取所需。共赢。

正如报道所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等，这些内容在各大平台有着上亿规模的播放量，视频平台已然成为

年轻一代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尤其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一些理工科的学生竟然也对社科领域的大家所吸引，沉浸在人文知识的海洋。这种本专业之外的通识滋养，对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大有裨益，就算只是利用零碎时间多听了几堂课，也能开阔视野。

有人会说，视频平台上的课程，提供的仅是知识领域的“快消品”。的确，视频平台的教学内容与大学课堂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更加大众化，而不会那么专而精。但在我看来，教学质量的高低，并不一定与课程内容的专精程度挂钩，知识的层次也没有轻重之分。没有哪个负责的学者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那些名师更是如此。尤其是面对开放性、传播效率高的网络平台，老师往往更愿意精雕细琢，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当然，基于网络传播的需要，网上的课程可能比较碎片化，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及深刻性。这种情况下，求学者除了借助网络大学，也要学会搜索更多学习资源，给自己补齐知识短板。

在高校工作多年，我也体验过大小教室的滋味，总体上的感觉，还是严肃多于活泼，如果将来有一天，遇到合适的机会，我很乐意对摄像头和网络愉快开讲，与网络另一端的“学生”互动。其实，总是板着脸孔的我也很想知道，自己的那点“存货”，到底能不能吸引粉丝，又能博得几个点赞、转发、收藏。



乡村学校普遍缺乏专业的体育、音乐、美术教师，很少组织相关文体活动。一些留守儿童在感情上比较孤独，智能手机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专家建议，乡村学校、村集体要加强文体教育，建设阅览室、篮球场、乒乓球台等可供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引导学生开展健康的游戏活动。（新华社2月21日）

## 手机瘾

□ 史洪举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办法提出，每所学校应当配备至少1名法治副校长，师生人数多、有需求的学校，可以聘任2名以上5名以下法治副校长。并优先为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配备法治副校长。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应是法律的遵守者和维护者。对中小學生而言，法律意识和法律规范并非可有可无的“课外书”。因为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状态，再加上校园欺凌等恶性事

件的客观存在，中小小学校园恰恰是最需要法律保护和法律素养普及的场所。贯彻落实法治副校长制度，有利于将法治之光照射到每一名青少年身上。

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好奇心较强，自我控制能力和是非判断能力较差。与此同时，由于学校教学力量的有限，以及学科教师对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欠缺，不少学校无力顾及法治教育。从司法机关选派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储备和执法办案经验的法治副校长，恰恰可以补上这一短板。

从这方面来讲，法治副校长不仅不是形式，反而应该是每所中小学校的必需品和标准配置。实际上，法治副校长制度在各地早已有关探索和实践，且覆盖了

## 女性上得职场 男性也要 下得厨房

□ 了了

2月21日，针对公众关心的妇女、生育、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中国政协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陆杰华教授。其间，在谈及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陆杰华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陆杰华的这番发言，颇具洞见地指出了家庭事务这个被遮蔽的领域，对性别平等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不平等地位，值得社会思考与讨论。

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就业，是性别平权的重要一环，基于历史、社会层面的多重原因，多数国家的妇女都曾普遍处于“家庭主妇”或是“待字闺中”的状态，曾经的中国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城乡女性顺着社会变革的浪潮，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站上了各行各业的核心岗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初步照进了现实。然而，中国女性虽然普遍参与工作，阻碍女性在职场发展晋升的“玻璃天花板”仍存在于不少行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等传统积习，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甚广。

当女性告别“主妇”身份走向职场，和男性同场竞技时，双方看似实现了机会平等，其实却并未真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家庭事务中，男女两性负重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双方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

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但在带孩子、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事务中，妻子却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以此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一名女性如果过度关注职场事务，对家务有所怠慢，很容易被人指为“不顾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男性显然极少受到这样的审视与指责，甚至反而会因为爱做家务，被人讥讽为“小男人”“怕老婆”“家庭妇男”。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女性在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就业时，很难拿出和男性同等的个人精力。而在家庭内部，家务压力过度集中于一方，也是导致夫妻关系失衡的潜在矛盾源。

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主要数据情况。调查显示，1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到76.1%、67.5%和63.6%；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与此同时，女性在休息日的平均休闲时间（240分钟）也显著短于男性（297分钟）。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里投入的多了，在那里投入的就要少，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公共领域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就必须把这一目

## 回答 为什么考研 要先明确 读什么样的研

的心路历程，那些选择工作的同学通常已确立了清晰而坚定的方向，而选择读研的同学，包括自己在内，则大多尚处朦胧状态，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应该选择什么，于是希望通过读研深造获得一个缓冲期，逐步找到自己应该奔赴的人生下一站。

事实也是如此，读研期间，除了少数决心深耕学术的同学之外，大部分人都将主要精力花在寻找职业方向和求职准备上，例如广泛实习、考取证书、笔试面试等。从秋招到春招，硕士应届生一般会花费大半年时间找工作。已参加工作、考研究也有类似心态，硕士阶段更多被视为锚定职业方向、积累知识经验、锻炼实务技能的缓冲期。

究竟为什么考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而在于研。考的动机可以很多，有于前文提到的对未来的迷茫，有升职评级的需要，还有对某一专业的兴趣等。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无法真正起到缓冲作用，难以提供将个人素质与未来发展对接起来的路径，那么，考研就始终是悬空的。结果就是学生将读研当作任务，一些教师将研究生当作文凭过客，企业将硕士学历当作鸡肋，舆论持续疑惑为什么考研。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信息、渠道、平台支撑，硕士生求职时同当年本科面临的情况相差无几，求职季之前被课程、论文填满，

深度了解、思考相关行业的机会很少，求职季一开始便全天候投简历、笔试、面试，系统回顾个人知识积累、职业倾向的时间不多。这也造成毕业生在找工作时既各自为战又盲目趋同，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追逐那些公认为必须但未必适合自己的资格、奖励、机会。

在更加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当下，为什么考研问题也值得引起审视反思。研究生教育就一定是更注重理论研究，不切合实际的吗？在研究生年年火爆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让研究生教育变得更加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要解决“为什么考研”的问题，恐怕还需从“读什么样的研”开解。

□ 谭影子

近日，2022年度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陆续放榜。根据有关机构统计，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创下457万的新高，比2021年增长约80万。然而，与考研火热的趋势、激烈的竞争相对照的，却是艰难的就就业环境，硕士学历未必能找到称心工作。为什么考研，不仅让旁观者疑惑不解、各执一词，在前赴后继的考研究心中，也难解个中缘由。

本科毕业之际，笔者也曾亲历过读、研的分流抉择。回想当初自己和身边同学